

宁波新闻丛书之一

记者往事

主编 任和君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者往事/任和君主编.一宁波:宁波出版社,
2003.1

(宁波新闻丛书)

ISBN 7-80602-597-9

I. 记... II. 任... III. 新闻事业史—宁波市—文
集 IV. G219.275.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6018 号

责任编辑:王伯城

封面设计:沈师白

宁波新闻丛书

任和君主编

* * * * *

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邮编:315000

浙江上虞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25 字数:300 千

2003 年第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80602-597-9/G·278

定价:共二册 28.00 元

编辑委员会

主任:何守先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梁 任和君 陈立春

陈学仁 何守先 郑继侨

张明菊 徐 炎 杨顺福

努力办好党的新闻事业

(代序)

任和君

记协——新闻工作者协会,是党领导下的广大新闻工作者的群众性组织,记协又是记者之家,也是全体新闻从业人员之家。

在市记协成立 15 周年之际,在老新闻工作者的倡议下,广大新闻工作者以自己的实践成果,祝贺市记协成立纪念日,准备出一本《记者往事》及《论文集》。我受委托,为本书作序。但我想换个形式,不就文章谈文章,而从新闻与实践上谈谈对新闻的党性及新闻事业发展的一些看法。

(一)

长期来,在新闻界与社会上关于新闻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个议论的热点。针对这种情况,我在报社的干部会议和有关论文中,多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最高代表,从而得出党性和人民性辩证统一的结论。引导采编人员、干部正确认识新闻自由,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1.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我们可用各种体裁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情况。这样的前提,是一种限制,是否我们的新闻就失去了自由呢?没有。试问没有前提的自由、民主何在?在一些所谓自由的和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新闻不能反对自己的出资人,当然也不能涉及王室的私事。特别是 1999 年 5

月7日后,美国的主流媒体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问题上,不仅三缄其口,且百般狡辩为克林顿政府粉饰。那么,他们有什么资格标榜自由、民主和人权呢?

由此我们认为。各种生产方式下有各种标准的自由。我们的新闻首先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正面宣传为主,这就是我们的自由。

2. 资本主义的新闻纪律也是严格的,他们看来似乎可以自由采写,但最后刊登的也只是政治上需要的或者政治上无关紧要的。比如,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世贸大厦遭恐怖分子袭击,死伤数千人,而死者惨状场面并没有见诸报端,这也是一种稳定人心的政治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也许这张报纸可以和那张报纸辩论,内部却不能有什么矛盾,至少不能表面化。一旦发生矛盾,一纸解聘是最终结果,这比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自然简单得多。

而我们要求新闻工作者遵守新闻纪律和职业道德也是一种政治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往往是教育为主,“多换思想少换人”,比资本主义宽容得多。

3. 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暂时的人均收入高,也是建立在相对贫困的基础上的。普通记者、编辑往往只能拿到总编辑十分之一的收入。这种悬殊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报社和其他主流媒体目前是不可能的。于是,优雅的别墅公寓与低湿的木屋并存,灯红酒绿与街头乞丐同在,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掩盖了闪闪发光的金钱的多寡。

在我们的新闻界,领导和一般工作人员人格上平等,经济上尽管实行多劳多得,但遵循着共同富裕的原则,工资奖金的差异是不大的。

关于新闻自由的种种情况,在我有机会随省新闻代表团访问台湾的一些报刊和电台、电视台后,得到进一步证实。台湾的一些报纸涉及其自身利益的时候,对一些明显的社会问题,如槟榔易诱

发口腔癌，都不敢披露，他们还能说大陆没有新闻自由吗？

上述表明，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下所谓自由也是有限度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民主与自由，也不可能有绝对的新闻自由。而我们党报和其他新闻媒体作为党的喉舌，公开表明要坚持党性，决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的新闻又是相对自由的，其基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

所以，我们要始终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台的要求，只有这样，我们的报台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新闻事业才能进一步发展。

(二)

随着党中央关于“两个根本转变”观点的提出，现代化集约型企业及市场经济将逐步形成，特别是随着入世，逐渐与世界接轨，这就对党的新闻媒体的负责人提出较高的知识水平和领导能力的要求。我个人深切体会，若不认真学习、运用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理论，若不学习弄懂现代经济知识，是很难适应国际国内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形势的，新闻事业也是难以发展的。

在过去几年，宁波新闻界在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台，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对新闻事业面向市场方面主要做了两件事。

一是抓住“发展是硬道理”，在广告等经营环节下功夫。在强调社会效益优先的同时，通过“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的办法，立足宁波，面向全省、以及省外主要城市，使广告经营均衡有序地持续发展。以宁波日报社为例，经营收入从1990年300万元上升到2001年1.9亿元。1995年后创办的《宁波晚报》，由于实行“日稳晚发”（即日报稳定，晚报发展）政策，广告连年翻番，2001年营业额达到8000万元。我市广播电视台发展迅速，广告连年增长，在同级城市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既是我市经济地位决定的，是市级新闻单位在当地的信誉和地位的体现，也离不开全体采编人

员共同支持,最重要的是调动了广告人员的积极性。报纸的发行量在版面扩大,报种增加的情况下,仍稳中有升,《宁波日报》发行量2001年初近15万份,《宁波晚报》发行超过24万份;在省新闻出版局关心下,2001年创办《东南商报》,发行量为12万份以上。印刷是直接关系出版的关键,前几年,更新机器设备,走内含和外延相结合、以内含为主扩大再生产的路子,建立了印务中心,使彩色印刷成为经常的事。县市报和广电系统更是成绩显著。

发展即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还要受到生产力其他要素的制约。随着事业的发展,采编力量显得不足,在经营生产部门人才尤其缺乏。所以,生产力发展不光是引进机器,引进与培训人才同样十分重要。

二是在提高原有人员素质基础上去引进人才,以稳定整个队伍。全市新闻从业人员从10年前的1000多人,发展到目前近3000人。这些人中间,主要是新分配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是从社会上引进的。

各新闻单位采取各种措施,对采编人员、职工进行业务培训。还与浙大新闻学院联办新闻学课程研究生班,有30多个业务骨干参加了学习。前几年新闻单位还举办了电脑操作培训班,50周岁以下的采编人员、职工普遍得到轮训。

所有这些,都是靠改革的办法来进行的。由于我们较好地驾驭改革、发展、稳定的三者关系,一个时期又有一个侧重。所以在舆论上能坚决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办,在事业发展上也能把党中央指示化作自己的行动。

总之,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应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形势下特别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学习党的领袖对新闻工作的重要论述。同时,一定要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紧密联系市委提出的建设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和提前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联系新闻单位发展实际,

集中精神,虚心学习新闻界前辈的道德、文章,学习兄弟单位的先进经验,把党的新闻事业办得更好。

2002年1月

目 录

努力办好党的新闻事业(代序).....	任和君(1)
我的新闻生涯.....	徐 炎(1)
在游击区当记者杂忆	胡 春(17)
解放初期的记者活动	陈天章(33)
学习——为了新中国	杨 牝(38)
我的新闻情结	穆崇德(43)
我的六篇新闻工作纪实	何守先(47)
新闻工作半世纪	张贤衷(61)
难忘的一次采访	蔡志达(66)
20 年报刊美术工作回顾	胡鹤声(68)
艰苦办台话当年	钱福海(71)
播音室里度春秋	童秀元(76)
从播音员到主持人	王 瑛(80)
初试的教益	石奇才(85)
追忆采访四明山夏家岭	陈 方(87)
忆一次教训深刻的误导	余 成(90)
从放牛娃到高级记者	罗品棠(94)
几个脚印	王宝华(99)
虚心学习 当好记者.....	王增章(105)
记者生活 40 年	沈家振(108)
在 60 年代当记者	曹曼卿(116)
想起“一·一六”这个日子	戴开仁(121)
建造宁波电台广播大楼始末.....	王 梁(125)
复刊前去南京日报社取经追记.....	方 平(129)

复刊初期的副刊、专页	周律之(135)
浪花	沈长根(138)
办报甘苦杂感	郑文权(141)
多写现场报道	於平(143)
我写批评稿	靳书伦(145)
10年城市有线广播工作回顾	邱雪尔(147)
建台创业不言艰	郑继侨(154)
当台长的回顾	陈立春(167)
关于舆论监督的一些思考	王泰栋(177)
在洪灾险情面前	朱步兴(180)

我的新闻生涯

徐 炎

1947年8月,我在上海,通过地下党员的引导,进入了浙东四明山革命根据地。两个月后,就被分配到“文化公司”(即四明简讯社),从此开始了我的新闻生涯。总起来看,除了“文革”前后一段时间,被迫离开过新闻岗位以外,其余则在不同的报纸工作,直至1985年离休。因此可以说,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总是同新闻(主要是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的。

回顾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有过兴奋,悲壮,欢乐,忧伤,直到今天安定幸福的晚年。这里记下的一鳞半爪,对于了解这个历史阶段的宁波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者的概貌,以及其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可能有点拾遗补缺的作用吧!

以下是分段的记述:

一、四明山上

我进“文化公司”时,还没有出版报纸,却在为办报作准备。那时,由中共四明工委主办一种《新华电讯》小册子,是收抄新华社的明码电讯,选编成油印小册子,发给当时的县区干部作为学习资料,通过它来向群众宣传鼓动,借以认清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和进展情况。我参加了这一抄写和油印工作,开始知道了“新华通讯社”这个名称,以及“电头”、“标题”等等术语,初次了解新闻的一些

概念。

1948年3月，油印的《四明简讯》正式出版，这是作为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四明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报。起初是八开两版，后来扩为四开四版。在当时的游击区出版这样一张报纸，不是很容易的事。在四面白色恐怖包围的环境下，要依靠地下党同志，通过层层环节的采购、运输和传递，冒着生命危险，才能给我们弄到一架上海产的手摇速印机；还要通过各种关系、借着各种伪装才能采购到收报机和零配件，以及电池、纸张和油墨等等，因为，所有这些物资，都是国民党军事封锁下的“违禁品”，万一被那些“警犬”们嗅出一丝气息，采购者就有被捕坐牢之险。但是，在我们出报的一年多时间里，除了1949年2月22日的那次被破坏以外（详情后述），基本上保证了物资供应无缺，这都是各地方党组织严密工作、忘我奋斗的结果。

《四明简讯》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从上海进入游击区的大专学生和职员，也有一些本地的知识青年，初期的负责人是乐子型、梅寒白；后期（1948年底以后）为徐炎、邹清。大家的革命热情很高，



摄于1949年初

竹材林中的草舍（“四明简讯”办公处）

图中后排（左二）为刘超、（左四）为丁千烈士、
前排邹清和徐炎

但对办报的经验却缺少。其中只有梅寒白、邹清、何其、肖容等同志，在上海的新闻专科学校读过几年书，知道一些新闻知识，但他们都忙于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学到的东西并不多，更无办报的实践。幸好，当时分管领导我们报社的四明工委宣传部长薛驹同志，是在苏北解放区办过报纸的，他不仅会写得一手整齐漂亮的钢板字，还在办报的指导思想（诸如党性、指导性、真实性、群众性等）方面，给我们作详细讲解，而且还手把手地教会我们如何刻蜡纸、画小报头、写美术字、划版样等等。那时，我对于刻写钢板字完全外行，在蜡纸上写一横一直就常常不听使唤，歪歪斜斜，十分难看。薛部长就教我用小三角尺作帮手，依靠着小三角尺的直和横刻写，虽然进度慢些，但印出来看就比较方正了。在刻写大标题特别是《四明简讯》这个报头时，薛部长还教会我们用圆头铁笔来磨写，使蜡纸在油印时，既能清晰、美观，又较少损坏，印数也可以多些。我们就是这样边干边学，从实践中增长才干的。

《四明简讯》在开办初期，主要刊登新华社明码电讯，内容大多是报道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反攻战绩、解放区和根据地的生产建设和支援前线的活动，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民怨沸腾，工人、学生运动震撼蒋家王朝的概貌。稍后一段时间，报纸也开始增加登载本地新闻。这是因为，当时四明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已有较大发展，除了原有的浙东解放军三支队以外，又在 1948 年 5 月间，从上海浦东渡海过来一支由我党长期控制的表面上是国民党的地方部队，编入为浙东解放军的第五支队。再加上各县区武工队、民兵等等，经常袭击敌人的乡镇公所，锄奸歼敌；有时也打击部分国民党保安部队等等。与此同时，经过地方党组织的艰苦工作，各种翻身队、打猎队、妇女队等等群众团体也纷纷建立，活动频繁，这样就有不少信息和经验急待报纸来传播。报社方面，则在浙东临委帮助下，先后确定了何其、胡春同志为特派记者，后来又有张志坚、吕少大同志等，经常跟随部队流动，边战斗边采访报道；在各

县办和各区搞民运工作的同志中，也约请了一些有文字表达能力的知识青年，担任报纸的通讯员，提供各种信息。因此，在小小的报纸上，既有反映国内外大事的解放战争胜利进军的消息、通讯、故事，和国内国际的时事述评（新华社的）；也报道了本地部队游击歼敌的战绩和蒋军起义投诚等信息；群众要求翻身求解放的热情和活动，也常见报端。此外，还有一定篇幅刊登文艺作品（如马灯调、叹五更、枪杆诗、战士识字读本等），可称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了。从1948年3月到1949年5月25日，《四明简讯》一共出版了66期，印发数在200到500份之间。发行范围，除了我们游击区的机关、部队干部战士和地方党员及群众积极分子以外，有时还寄给国民党的政府官员，甚至乘机塞入敌军的碉堡，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如约法八章、城市政策、土地法大纲等，借以瓦解敌军。

在四明山上办报，有许多想像不到的困难。首先是没有现成的房子，只能依靠当地山区的党员用篾簟（即竹皮所编织的席子，原为晒谷用）和树枝搭建成草舍隐藏在浓密的柴山或竹山间，以防敌人的发现。对于这些草舍，我们都戏称它为“公馆”。说到“公馆”，革命先烈——原中共鄞慈县特派员朱洪山同志（他在1946年末牺牲在鄞西潘岙）曾用革命浪漫主义的笔调，有过一番描述，他说：

“深山密林小公馆，金毯铺地金条围四边。不动椅子自动桌，滑轮眠床沙发垫。长年不断自来水，烧饭煮菜不冒烟，不是无聊享清福，只为革命做‘神仙’”。

诗里所指的金毯、金条就是茅草，自动桌指脚膝盖，不动椅即石头，自来水是溪水。我们所住的“公馆”大体也如此。我们每流动到一地，还都根据当地的特点给我们的“公馆”取名，计有“蛇公馆”、“蚂蝗公馆”、“蚊虫公馆”、“考验公馆”等等。从这些“公馆”名称中，可以看出，我们经常是与这些害虫为邻为伍的状况。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所谓“考验公馆”，这是指余姚陆埠镇附近的梅岭栎

山上(现属洪山乡)的一所“公馆”，在那里，我们小小的报社十几人队伍中，竟有两人(刘超、丁千)成为烈士，三人(潘善帮、李炳阳、刘茂文)被俘，还有两三人受轻伤。由于这是对每个革命战士的生死考验，故后来就追取“考验”为这个“公馆”的名称。

那是 1949 年 2 月 22 日中午的事。当时我们正在用餐，突然听到后山头枪声大作，吆喝连连，始知敌人前来偷袭。因本单位均是文职人员，女同志占五六人，没有武装保卫，无法应战，只得紧急撤离。刘超、丁千两同志因为高度近视，又是刚从上海来此不久，路径不熟，不幸当即被敌击中倒地，后来还被用火烧焦全身，惨不忍睹。潘、李、刘三人，则因没有撤离而被俘(后被营救出狱)，机器、设备、纸张等等悉遭焚毁。出事后的当夜，在敌军撤离后，我就赶到现场，集拢了一些没有走远的同志，稍后，又找到不少走散的同志，并掩埋了牺牲的战友。地方党同志还侦查了出事的原因，惩办了一名向敌军告密的特务。不久，在上级党派来的联络员带领下，跳出了这一地区，前往与四明工委机关会合，直到 4 月 17 日，又恢复了报纸的出版。从 2 月 19 日出版的第 54 期，到 4 月 17 日出版的第 55 期，其间共停刊 56 天。等到 5 月 7 日，四明山区的重镇梁弄为我军解放，我们的报纸才结束了流动的草舍生活，进入城镇的房屋内，有桌椅办公了，而且是在公开、自由和充满胜利气氛中工作。我们《四明简讯》的终刊号是 1949 年 5 月 25 日出版的第 66 期，这天正是宁波解放的大喜日子。

二、进城伊始

火红的五月，处处洋溢着胜利的喜悦气氛。随着宁波的解放，《四明简讯》完成了迎接黎明的历史使命。我们报社一行 10 余人，在 6 月初，奉命从梁弄镇经余姚县城小住休整数天，就一路步行到宁波市。在沿途中，特别是宁波街头，到处是口号标语和革命歌

声。我们在旧县政府里(现为原市政府所在地)住下待命。不久就被重新分配工作。一部分同志被调到杭州浙江日报社,我和邹清、肖容、陈天章等同志则留下来,筹办新华社宁波支社,并筹备同时作为即将建立的中共宁波地委机关报

——《甬江日报》的采编部。还在我们进城之前,进驻宁波的人民解放军第22军政治部宣传部的一部分同志

(郑汉杰、吕宪平、杨甡等),和从会稽地区经杭州进入宁波的原浙东临委派去办《浙东简讯》的同志(他们原来就是从《四明简讯》社调去的,如何其、肖鱼、方天、孙肇等),已经先期接管了原国民党的《宁波日报》,并已在6月1日出版了铅印的《新华电讯》。这个《新华电讯》只出版两个月左右,就转为后来的《甬江日报》。

在《新华电讯》出版期间,我被任命为新华社宁波支社广播编辑,也做采访记者,但都没有做好,这是一段幼稚可笑的经历。当时的新华社社长是由薛驹同志兼任,但他是宁波军管会的文教部副部长,又兼任余姚军管会副主任,忙得不亦乐乎,接管文教机构啦,筹办青年干部学校啦等等,根本无法照管我们的日常工作。因此只好由我们几个从《四明简讯》社进城的同志和新吸收的一些知识青年来支撑局面。可是我们在《四明简讯》社所熟悉的那一套,同解放后所遇到的内容和形式已有很大的不同。当时虽然还有追歼残敌和镇压反革命等武装斗争,但大量的工作和报道内容是恢复生产、救济失业工人、劳资纠纷、农村生产度荒、建立基层政



摄于1949年7月1日,时为《甬江日报》的主要采编骨干

后排:(自左向右)为:邹清、肖容、徐炎

前排:(自左向右)为:何其、方天、肖鱼

权和群众团体等等。碰到的群众集会特别多，有学生的、教师的、工人的、店员的，还有农会的等等。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常常抓不住中心，记者的情绪也往往被各种会议所左右。写新闻总是又冗长又庞杂，从会议的开头如何，一直到向毛主席发致敬电等等，既没有突出主题，也不讲究章法，一篇新闻写几百字、一二千字，还不知道说清楚什么问题。当时根据新华社规定，我们支社要通过电报局用新闻电报方式向新华社浙江分社发稿由分社择优发总社。可是，我们每天“积极”发稿，却很少被采用，更未见由总社播发过；虽然早出晚归，疲于奔命，外出时还身带短枪，以防敌特暗算（当时确曾发生冷枪伤人事例），但眼看劳动成果缺乏效果，心里总是忐忑不安。这时，《新华电讯》的总编辑郑汉杰同志（已亡故），发现了我们的毛病和窘态，他就运用原是 22 军宣传部出身的老关系，商请 22 军政治部办的《麓水报》（也是新华社 22 军支社）中许多老记者如刘亮、李耐团、王玉章等同志（后来这些同志都是新华社的骨干），具体指导我们采访和写作。我还记得有一次庆祝大游行的特写，就是由他们带着我们一道采访并共同写出来的。此后还经常介绍他们的经验帮助我们这些新记者。他们这种言传身教、循循善诱的助人为乐精神，至今仍常萦我的脑际。

1949 年 8 月 8 日，中共宁波地委机关报——《甬江日报》正式创刊，我们这个新华社宁波支社，实际上成为《甬江日报》的采通部，对杭州的新华社浙江分社，也没有发稿任务了。《甬江日报》开始登载我们采写的本地新闻。这时的宁波，千孔百疮，百废待举。而且，已经逃窜到舟山的国民党军，还经常派出飞机来本市上空骚扰、投弹、扫射、发传单等等，特别是对新江桥和灵桥一带破坏得尤为严重，目的是妄图阻止我解放军的物资、装备通过这两座桥梁向镇海方向运送，抵制我军对舟山的解放。在敌机狂轰滥炸下，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这一严重情况不能不成为我们报纸的重要内容。这时，我们的记者肖容同志（已在 1984 年病故），经常出入